



## “孙中山与社会变革”学术研讨会开幕词

厉无畏

“孙中山与社会变革”学术研讨会今天开幕了！我代表上海中山学社全体同仁热烈欢迎各位光临，衷心感谢各位专家在百忙中参加研讨，贡献真知灼见。

孙中山先生是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是中国人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杰出代表。他提出的“三民主义”，是我国五四前 80 年里具有最完备形态并能对社会意识产生重大影响理论；他所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几千年封建君主专制统治，建立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民主共和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民国成立以后，他又率领革命党人反对袁世凯专制独裁、复辟帝制的逆流，领导了护法战争。他致力于我国的交通事业，热心于铁路建设计划。1917～1919 年，在上海写成了著名的《建国方略》，系统阐述了“行易知难”的哲学思想、开发中国的“实业计划”和增进民智的“民权初步”，对当时和尔后的中国政治、经济、思想建设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之后，他改组国民党，主张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重新解释“三民主义”并实现了国共合作。综观孙中山先生光辉的一生，他的“三民主义”思想体系、他的民主革命实践、他在临时大总统任上颁布的一系列旨在革除“旧染污俗”的政令，诸如禁缠足、改称谓、废跪拜、倡女权、剪发辫、易服饰等等，都对中国社会走

出中世纪、迈进近代化产生了重大而且深刻的影响。

历史是了解国运民情、开发民智、激励民气的最好教材。具有 5000 年悠久历史和灿烂文明的中华民族,向来有以史为鉴、以史资治的优良传统,有着温故知新、继往开来的进取开拓精神。我们这个研讨会,就是为了充分发挥史学特具的垂训鉴戒功能,集在座各位专家、学者之长,对孙中山先生的思想、理论、计划、实践如何促进中国社会变革、如何推动中国社会发展进行深入讨论,以期总结历史经验,为中国社会在 21 世纪中获取更大的进步,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学者的睿智卓识。

各位专家,女士们、先生们:

上海中山学社是由民革上海市委、民盟上海市委发起,由孙中山研究工作者及热心于孙中山研究的人士组成的学术团体,是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上海市社联)的团体会员之一。其宗旨是发扬爱国主义精神,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积极开展学术活动,密切海内外学术交流,促进团结,为研究孙中山和繁荣社会科学作出贡献。

上海中山学社成立于 1987 年,首任社长是民革上海市委主委赵祖康先生,副社长有民革上海市委副主委李赣驹先生、民盟上海市委副主委翁曙冠先生、陆诒先生以及著名历史学家陈旭麓教授、上海社科院唐振常研究员和丁日初研究员。1998 年根据上海市社联关于学会领导机构年轻化的规定精神进行了换届选举,选出了新一届领导班子。

1990 年,上海中山学社为促进孙中山和近代中国史的深入研究,决定创办不定期的学术丛刊《近代中国》,由丁日初先生任主编。计划每年出一辑,每辑 30 万字左右,发表本社和海内外学者研究孙中山、辛亥革命和近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社会以及海外华侨等领域的研究成果,自 1991 年第一辑面世,已出至第十辑。由于刊物坚持学术质量第一的标准,十年来,《近代中国》在国

内外学者中获得广泛好评。包括日本、法国、美国、澳大利亚、新加坡、马来西亚、韩国以及我国港、澳、台地区在内的海内外不少著名学者，对刊物热情关注和支持，使学社和刊物编辑同仁深为感奋。乘此机会，我代表刊物编委，真诚请求各位专家学者经常惠赐佳构力作。

为了促进海峡两岸的学术交流，上海中山学社于 1990 年 8 月在上海举办了有大陆和台湾两地专家、学者参加的“孙中山与中国现代化”学术讨论会。上海社会科学院有关研究所、大学以及新闻出版机构等 17 个单位 40 余人和来自台湾的 18 位学者出席了会议。会议收到论文 26 篇。沪、台两地学者就“中国现代化的历程”和“孙中山关于实现中国现代化的思想”两项主题进行了热烈深入的讨论。两地学者还就海峡两岸对孙中山的研究状况、孙中山研究资料收藏等情况作了介绍和交流。

1994 年 5 月上海中山学社举行了“孙中山与海外华人”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北京、广东、福建、上海、台湾以及新加坡、美国等地的 40 位学者出席了会议。会议围绕孙中山与海外华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海外华人的状况、全球华人如何迎接新世纪的来临等三大议题进行了讨论。新见迭出，气氛热烈。会议期间，美国和新加坡学者介绍了海外中山学社以及海外孙中山研究的进展情况；郑竹园教授并代表总部设在美国芝加哥的“海外中山学社”向上海中山学社赠送了镌有“弘扬中山思想”的匾额；台湾中山学社也为会议发来了贺电。

1995 年海外中山学社在美国芝加哥召开“展望 21 世纪的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邀请上海中山学社派代表参加。后因故未能出席。

这次研讨会已经是上海中山学社第三次与海内外学者切磋交流，会议非常荣幸地请到了不少研究孙中山和辛亥革命史、中华民国史、中国近代经济史、近代社会史、思想史、文化史、上海史等众

多领域的知名学者，其中不少是老朋友。我代表上海中山学社全体同仁向各位表示热烈欢迎和衷心感谢。

各位专家，学术是天下之公器，没有国界和地域的囿限；学术讨论是不同意见的切磋琢磨，应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我们热切期望通过实事求是、求同存异的学术讨论，能够更深入理解孙中山先生的思想体系和孙文学说，更好地贯彻中山先生为促进社会进步和建设中国臻于富强之域的遗愿，为实现祖国统一大业而贡献我们的良知良能。我们热切期望通过自由争鸣的学术研讨，进一步加强海峡两岸学者的学术交流，加强上海与全国各地、与世界各国学术界的交流与互访，把孙中山研究推进到更高的境界。

作为东道主，我们尽力想把会议办好，让各位专家学者在紧张讨论之余，看看上海这些年来的变化和发展。孙中山先生最早提出了开发浦东的设想，如今上海的繁荣和发展，定能让中山先生含笑九泉。

最后，预祝会议成功。祝大家身体健康，愿友谊长在。

（厉无畏，1942年生，上海社会科学院部门经济所所长，上海中山学社社长）

## 研讨会成功和一点希望

——在“孙中山与社会变革”学术研讨会闭幕式上的发言

尚明轩

我很高兴来参加上海中学学社举办的这次学术研讨会，与同志们切磋砥砺，进行学术交流。

这次研讨会的主题是“孙中山与社会变革”。也就是说希望学者们用更广阔的视野，把孙中山与社会变革，放在近代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放在 20 世纪的中国，放在孙中山一生革命的背景下去以考察和研究。这个主题，视野广大，内容丰富，包容性强，覆盖面宽；加之现在正处在新旧世纪之交，我国又在进行着各个方面的社会变革，所以完全可以进行广泛、深入的研讨。既可以论述和评价孙中山的社会变革思想渊源、内涵和各个方面（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的变革方案，以及他的变革实践，又可以从全面的、客观的和战略的高度，对他的变革思想与同时代的各种变革思潮，诸如维新思潮、立宪思潮、教育救国思潮、实业救国思潮、专制复辟思潮、社会主义思潮等进行比较研究；还可以对他的社会变革实践与欧、美、日等国的社会变革实践，进行对照和比较研究，从而总结孙中山在这些方面的经验教训，揭示出在社会变革方面不同层次的规律，为当前我国的社会变革提供借鉴。

近代中国，孙中山在领导振兴中华的民主革命过程中，是探索社会变革、追求社会变革、鼓吹社会变革与实践社会变革的一位杰

出代表。他关于社会变革的思想、方案和蓝图，集中反映在他的几部重要著述中，主要是《上李鸿章书》、《在东京〈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上的演说》、《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等。可以说，孙中山对社会变革的构思、选择与实践，远远超过了他的前人与同辈人，成为 19、20 世纪交汇时刻最科学、最先进的构思和方案。这些是孙中山留给后人的一笔丰富的思想遗产。

两天来，与会学者们围绕这一主题，通过宣讲论文，分组讨论，互相切磋，交流心得，彼此了解到自己所不熟悉或新鲜的观点和材料，起到了相互促进和提高的作用，也推进了有关孙中山的学术研究。不论在会上或会下，自始至终洋溢着友好和谐的气氛，既有热烈的争论，又有认真的探讨。学者们都是以严谨的科学态度和高度的历史责任感，结合新资料和新形势，从不同角度各抒己见，百家争鸣。

我粗粗拜读了学者们提交会议的 30 余篇论文或提纲，总的来看，质量是好的，水平是高的，相当一部分论文对孙中山社会变革思想的研究，在史实和观点上有了丰富的发展和新的突破，呈现出对这一专题研究的百家争鸣和学术氛围。可以说，经过与会学者的共同努力，这次研讨会圆满成功，达到预期的目的。我想在座各位先生都会同意：这次研讨会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孙中山与社会变革这一专题中取得了新进展。它是一次成果显著的学术研讨会。

台湾地区的学者也向会议提供了有质量的论文。海内外的学者欢聚一堂，这种“以文会友”，进一步增进了相互了解和友谊。我认为，这次研讨会对弘扬孙中山先生革命思想和不屈不挠的革命精神，推进学术研究，增强对社会变革的进一步认识，促进祖国的完整统一，都将会起着积极的作用。

总览提交的论文，不管探讨的问题是什么，一般都言之有物，不停留在叙述一些人们熟知的历史现象，而是从不同的角度分析

和论证，力图通过这些错综复杂的历史现象，深入一步地说明历史为什么会这样发展，使人读后能有所得。可以看出，论文作者是本着严肃的治学态度，以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作为自己研究的出发点，尽可能系统详尽地掌握可靠的历史资料，进行细致的分析和综合的研究，力求还历史的本来面目，很少那些人云亦云的陈词滥调和缺乏事实依据的空泛议论。这种良好的学风，使与会的论文质量有了比较可靠的保证。事实上也只有这种切实的研究工作，才能将孙中山研究不断地推向前进。

对研讨会本身，我认为美中不足的是，论文送到各位与会者手中的时间比较晚，来不及在讨论会前仔细阅读；从讨论的状况来看，可能由于时间的限制，会上讨论发言时间较少，没有能够充分地展开讨论，难以深入地交换意见。不过，来日方长，今后期盼同道们多多加强联系和交流，大家共同齐努力，推动孙中山的研究工作能够不断深入前进和丰富发展。

（尚明轩，1925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 “孙中山与社会变革”学术研讨会综述

戴鞍钢

上海中山学社主办的“孙中山与社会变革”学术研讨会，2000年8月28日至30日在上海举行。来自北京、台湾、广东、江苏、湖南、福建和上海等地的50余名学者参加，提交论文35篇。日本学者横山宏章也向会议提交了论文。台湾学者张朋园出席了开幕式。学者们围绕着会议主题，切磋交流，讨论热烈，新见迭出。

### 一、孙中山的政治民主化思想

这是此次研讨会讨论的一个热点问题。张磊（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的《争取独立、民主和富强的民主革命与近代化纲领》，以近代化为纲，对‘近代’时期的社会内涵等几个方面作了精辟的探讨。指出民主政治是民主革命的主要目标和促进近代化的杠杆。孙中山主张通过‘国民革命’，推翻作为‘恶劣政治之根本’的封建专制制度，代之以共和制度。他为共和政体的擘画煞费苦心，力求完满实现民主建政。革命程序论表述了民主建政的主要内容和阶段划分，政党政治论阐明了“代议政治”的基本准则，权能区别论规定了民主政治的实际内容——人民有‘权’，政府有‘能’，地方自治论和全民政治论则体现“主权在民”精神的具体方案，五权宪法论主要是分权主义的理想政府结构的蓝图。这方面的探索是有积极意义的尝试。



阎小波(南京大学)提交的《论孙中山的唯宪法主义》,是他对中国近代思想家关于议会/宪法认识演变作系统研究的一部分,经过讨论修改后,全文题为《从议会主义到宪法主义》,对魏源直至孙中山的民主诉求进行细致的论析,并提出新见。(见本刊本辑)

谢俊美(华东师范大学)《关于民初总统制与责任内阁制问题平议》,认为一般所说《临时约法》改总统制为责任内阁制,实际上并未做到,却无意之中造成了变相的总统制;但当时制宪着革命党人等未能觉察,仍然执着地遵循责任内阁制的原则行事。(载本刊第十辑)。

张元隆(上海大学)《孙中山与近代国家观念的发展》,认为孙中山提出三民主义建设近代国家的政治理论,是当时中国人关于国家观念的最高水准。他用国民的四个权利(选举权、罢免权、创制权、受决权)来管理政府的五个治权(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考试权、监察权),促进了国家政治的近代化。这种国家学说,努力“集合中外的精华,防止一切的流弊”,寻求民族与世界、现实与理想的有机整合。

横山宏章(日本西博尔德大学)《关于孙中山对西欧式代议政体的批判和台湾的政治改革》,认为孙中山的国家建设论有三个特点:不立刻引进民主政体,而由军政→训政→宪政的顺序,逐步实现政治民主化;不采取以民意决定政体的民主程序,而由革命政党国民党建设国家,由上而下实现民主化;即使到达宪政时期,以三权分立的西欧式代议政体不适合中国,而以行政部门主导的政治为理想。

杨元华(上海师范大学)《孙中山的‘五权宪法’学说与国民政府的‘五院制’》,指出‘五权宪法’学说在历史上具有积极意义,但也有局限性,即这种‘权能分立’学说,不仅同孙中山自己提出的直接民权主张相矛盾;且其结果,使人民落到无权的地位,这个政府也不可能成为‘万能政府’或‘为人民谋幸福’的政府。

何益忠（华东政法学院）《民初政党政治实践与孙中山政党思想的变化》，认为通过民初政治实践的失败，孙中山改变了原来的政党政治思想，即经历了从赞同西方的政党竞争、互相监督、轮流执政到要消灭一切反对党，将全国人民都变成革命党的变化。孙中山提出在实现宪政之前安排一个训政，正是对中国社会反思的结果。

## 二、孙中山的经济建设理论和方案

刘学照（华东师范大学）《民生史观新议》，认为今日宜走出对民生史观的一般哲理性讨论。指出：它是一种力图“从经济学中寻找‘终极原因’的历史观，应具体评析民生史观哲理性和政策性的两个层面；民生史观丰富了现代中国社会变革思想的宝库。（见本刊本辑）

郭汉民（湖南师范大学）《孙中山经济近代化蓝图的若干特色》，指出具有四个突出特点：将交通运输事业和基础设施建设置于整个经济建设的‘关键和根本’的位置，以海港为中心，形成外向型经济发展格局；以工业化为中心，实现国民经济的全面振兴；以开放促发展。孙中山的《上李鸿章书》到《实业计划》是他对中国经济近代化不断探索的宝贵记录。

李一翔（上海社会科学院）《孙中山的合作思想与国民党的合作运动》，指出孙中山在其民生主义经济理论体系中，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合作观点和主张（见本刊本辑）。

林家有（中山大学）《孙中山的中国工业近代化思想》，阐说孙中山关于中国工业化的理论。莫永明（《江海学刊》）《孙中山的财政政策与民初社会》指出，从民初社会可以看出社会变革与财政经济必须互相适应的重要性。

### 三、孙中山与近代中国社会变革

与会学者从各个角度对此问题作了广泛的探讨。张磊在前揭论文中,指出民主革命与近代化须臾离不开变革,变革是全面的,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

尚明轩(中国社会科学院)《孙中山塑造国民素质的思想》,认为社会变革同国民素质的提高(人的革命化)息息相关,互为因果。国民素质包括政治、文化、体能和心理道德等方面。面对目前社会上存在的一些重物质轻精神、重科技轻人文的现象,重温孙中山有关提高国民素质的论述,倍感意义深远。

方式光(广东省社会科学院)《试论孙中山的新道德观》,指出其内涵就是:铲除旧思想,发达新思想——“公共心”新道德就是应该“替众人服务”。孙中山要求革命党人发挥爱国之心,舍弃私心私利,专心为国为民谋取福利,高度赞扬自我牺牲的革命精神。

王关兴(上海师范大学)《试析孙中山的‘科教兴国’思想》,认为孙中山强调教育为立国之本,振兴中华之道,不可稍缓。普及教育是国民教育体系的基础,尤须注重女子和儿童教育。他还十分关心职业教育、社会教育和少数民族教育。国民教育指体育、智育、德育几方面。他重视科学技术知识,呼吁要拿这种“学问来救中国”。

与会学者还提交孙中山与社会变革其他领域的论文,如:苏智良《孙中山禁毒思想初探》、胡海英《孙中山与女权运动》、侯桂英《孙中山与民初剪辫运动》等。(以上三位均上海师范大学)

### 四、孙中山的祖国统一思想

季鸿生(上海师范大学)《略论孙中山的祖国统一思想》,指出孙中山的祖国统一思想很丰富,主要包括:帝国主义侵略和军阀反

动统治是造成中国不统一的根本原因；争取和平统一，但不排斥武力；召开国民会议解决国家统一问题。孙中山的祖国统一思想和实践，给后人留下巨大的精神财富，予今天正在为国家统一而奋斗的海内外中国人以极大的鼓舞和诸多启示。与会学者对这个问题颇为关注。

## 五、孙中山的其他思想和活动

郭绪印（上海师范大学）依据档案资料撰写《论孙中山与上海潮州会馆》，指出孙中山以传统的桑梓情怀争取上海潮州会馆等同乡团体在经济上支援革命。

赵雅书（台湾大学）通过实地考察研究，提交《孙中山先生在北美洲西北区温哥华、西雅图、波特兰、斯波肯等城市的活动》。查时杰（台湾大学）《孙中山先生与基督教会的关系初探——以早年在港、澳、穗三地为例》，两篇论文具有新意。此外还有徐梁伯（江苏省社会科学院）《〈行易知难〉立意崇高论证粗疏的革命哲学》、傅绍昌（华东师范大学）《孙中山在辛亥革命时期对社会主义和马克思学说的介绍》、盛永华（中国文物研究所）《孙中山民权主义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作用——兼论宋庆龄对民权主义的继承与发展》、邵雍（上海师范大学）《孙中山与民国绿林》等，抒发新意，拓展研究范围，为研讨论会增光添彩。

在研讨会的闭幕式上，赵雅书即席发言，对会议的成果给予很高评价，认为近几年祖国内地学者对孙中山研究的热情令人感奋，有幸参加了这次学术盛会，感到上海中山学社完全能够举办规模更大、层次更高的国际性学术研讨会。他相信，通过对孙中山思想和活动的深入研究，可以进一步加强海峡两岸同胞之间的思想沟通，实现中山先生振兴中华的伟大遗愿。尚明轩发言见本辑，从略。

会议期间，学者们在学术研讨之余，赴当今中国现代化建设前

沿的浦东实地考察，受到浦东新区政府的热情接待。浦东这块热土，曾是孙中山在规划中国发展蓝图时寄予深切期望的地方。他在《实业计划》中，明确提出了在乍浦与澈浦之间建设东方大港的理想方案，基于当时的客观条件，孙中山又把改造上海为东方大港作为具有可行性的实施方案，强调了把上海改造成现代化多功能港口城市的必要性，并对所需资金的筹集办法，以及实际工作的各个步骤等，都作了详尽的论述。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孙中山的宏愿长久延搁。如今，大家漫步在外滩观光带和陆家嘴金融区中心绿地，姹紫嫣红，风光宜人，周围一幢幢姿态各异的巍峨高楼，拔地而起，极为壮观；驱车于笔直宽阔的世纪大道，一处处新建项目扑面而来。登临 88 层高的金茂大厦，骋目远眺，繁华的大上海奔来眼底，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令人意气风发。抚今追昔，大家格外感念中山先生，倍感有责任争取早日实现祖国统一的伟业，以告慰为振兴中华鞠躬尽瘁、毕生奋斗的民族伟人——孙中山。

（戴鞍钢，1955 年生，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 民生史观新议

刘学照

对孙中山的民生史观，历来有许多评议。大体上说，先前的论者较多地从认定其“相类”或“近于甚至等于”唯物论方面给予评价。<sup>①</sup>后来则长期传衍一种意见，即主要从民生史观“实质上是二元论或唯心论”<sup>②</sup>上去立论，并逐步形成一种“一些合理因素和唯物主义成分+历史唯心主义本质”的总体评价模式。<sup>③</sup>时至今日，在中国已迈入 21 世纪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审视孙中山的民生史观，似宜走出以往的一般纯哲理性的讨论，而更多地重视和注力于对其真实本义和现实意义的研究。本文谨就此谈一些意见，祈识者不吝赐正。

## 一、“民生”是一个“社会经济”性质的词语

识者对民生史观之所以有唯心论或类、近唯物论等种种议论，除各自所依据的理论规范和评价模式有别所致外，主要是由于论

<sup>①</sup>参见曾纪宪：《中山先生的民生主义》，新党编：《中山先生思想概要》，爱知社 1926 年版，第 33 页；叶青：《三民主义底哲学基础》，时代思潮社 1942 年版，第 59 页。

<sup>②</sup>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 1955 年版，第 681 页。

<sup>③</sup>参见萧万源：《孙中山哲学思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182～191 页；冯契主编：《中国近代哲学史》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518～522 页。

者往往是从一种单一的视角去衡量民生一语的内涵，未能把握孙中山对民生和民生史观的表述具有一种庞杂性的特点，从而未能如实地认定‘民生’是一个‘社会经济’性质的词语。

要正确把握“民生”一词的含义，应首先了解孙中山正式提出民生主义和形成民生史观的历史过程。孙中山作为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一生都十分关切民生问题。早在 1896 年伦敦蒙难后考察欧美社会现状时，他洞察欧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极端贫富不均，社会革命思想由此发萌。1903 年他提出‘平均地权’的社会革命纲领，1905 年将其正式规定于同盟会章程中。同年 11 月，在讨论撰著《民报》发刊词时，为将平日所提倡之革命“以一民字贯之”，鉴于民族革命、政治革命已定名为‘民族’、‘民权’，经过商议，“遂以社会革命定名民生”，<sup>①</sup>贯彻“三大主义皆基本于民”的精神。<sup>②</sup>于是“民生主义”一语首先在《民报》发刊词中出现。

民生主义是孙中山民主革命思想中最富特色、最具创意的部分，他历来为之宣传和解说也特多。孙中山认为，按近代“欧美进化”的历史来看，随着 18、19 世纪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潮流先后兴起，“经济问题继政治问题之后，则民生主义跃跃然动，20 世纪不得不为民生主义擅扬之时代”。他主张革命党人应以前瞻性的眼光，“睹其祸害于未萌，诚可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sup>③</sup>1912 年民国建立之初，孙中山在各地演说中一再作实行民生主义的鼓动。强调：“统一以后，则重心又移在社会问题。”<sup>④</sup>同年 10 月，他《在上海中国社会党的演说》中谈到“社会主义为人类谋幸福”时说：“然为人类谋幸福，其着手之方法将何自乎？自不得

① 郝盛潮主编：《孙中山集外集补编》，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32 页。

② 孙中山：《〈民报〉发刊词》，《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75 页。

③ 孙中山：《〈民报〉发刊词》，《孙中山选集》，第 75、76 页。

④ 孙中山：《在湖北军政界代表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 2 卷，中华书局 1982 年版，第 335 页。

[不]溯人类致苦之原因。人类之在社会,有疾苦幸福之不同,生计实为其主动力。去[盖]人类之生活,亦莫不为生计所限制,是故生计完备,始可以存,生计断绝,终归于淘汰。社会主义既欲谋人类之幸福,当先谋人类生存,既欲谋人类之生存,当研究社会之经济。故社会主义者,一人类之经济主义也。’<sup>①</sup>显然,孙中山所说的‘生计’是属于‘社会之经济’范畴的一个术语。他所表达的‘生计’关系人类‘生活’‘生存’;实为‘人类之社会’的‘主动力’之思想,是他日后民生史观的萌芽。

1924年,孙中山在《民生主义》的演讲中正式提出以‘民生’为社会历史发展原因和动力的理论,并成为他社会历史观的核心。民生是什么?对这一词语的本义和本质属性如何理解,确是评定孙中山民生史观的一个前提性问题。孙中山在演讲中开宗明义地说:“‘民生’两个字是中国向来用惯的一个名词。我们常说什么‘国计民生’……多是信口而出,不求甚解”;但是今日科学大发明,在科学范围内拿这个名词来用于社会经济上,就觉得意义无穷了。我们今天就拿这个名词来下一个定义,可说民生就是人民的生活——社会的生存、国民的生计、群众的生命便是。”<sup>②</sup>显然,孙中山对‘民生’一词的释义是很清楚的,他是将旧词新用,“在科学范围内”<sup>334</sup>用于社会经济上。因此,他所说的‘民生’及其具体解释——人民的‘生活’、国民的‘生计’、社会的‘生存’和群众的‘生命’等述语,全当属于‘社会经济’的范畴。

孙中山不仅在释义上强调他所说的‘民生’是‘社会经济’性质的词语,而且在解释‘民生问题’之所以发生时,也是从近代经济发展和经济变迁方面予以说明。他指出:“民生问题,今日成了世界各国的潮流。”<sup>340</sup>因为这几十年来,各国的物质文明极进步,工商业很

<sup>①</sup> 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510页。

<sup>②</sup> 孙中山:《三民主义·民生主义》,《孙中山选集》,第802页。



发达,人类的生产力忽然增加。着实言之,就是由于发明了机器,世界文明先进的人类便逐渐不用人力来做工”,“便有许多人一时失业,没有工做,没有饭吃。这种大变动,外国叫做‘实业革命’,因为有了这种实业革命,工人便受很大痛苦。因为要解决这种痛苦,所以这几十年来便发生社会问题。”<sup>①</sup>不过,孙中山并未停留在这种比较质朴、粗犷,并专就生产力增加的解说上,他又进一步从近代生产关系的大变动方面立言,说:“现在欧美的工商业进步到很快,资本发达到极高,资本家专制达到了极点,一般人民都不能忍受。社会党想为人民解除这种专制的痛苦”,<sup>②</sup>从近代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方面较为全面、完整地说明了近代“民生问题”产生的社会根源。可见,孙中山无论是侧重从“实业革命”还是侧重从“资本发达”说明近代“民生”问题的产生,都是认定近代“民生问题”是伴随近代社会经济大变动而产生的“社会问题”,再次显示他所说的“民生”和“民生问题”是“社会经济”性的述语。

孙中山对自己的民生主义如同对他整个的三民主义一样,是非常自信的。他说:“‘民生’二字,为数千年已有之名词。至用之于政治经济上,则本总理始。非独中国向无所闻,即在外国亦属罕见。”<sup>③</sup>观照孙中山的有关论述,应该认为,他的自我评价是切实的。有的论者忽视孙中山用一种大历史的眼光使中国“民生”这个旧词焕发科学新义的理论价值和历史价值,他们从中国古书中征引“民生在勤”、“唯民生厚”和“民生国用”等旧有表述,证明使用“民生”一词古来有之,便责备孙中山“这句话未免言过其实”。<sup>④</sup>事实上,前已言及,孙中山再三强调自己是在“科学范围内”将旧词新

①孙中山:《三民主义·民生主义》,《孙中山选集》,第802、805页。

②孙中山:《三民主义·民生主义》,《孙中山选集》,第828页。

③孙中山:《关于民生主义之说明》,《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版,第112页。

④萧万源:《孙中山哲学思想》,第170~171页。